

傳統與現代的激蕩

——論劉毓盤的詞學與教育^{*}

吳志廉

提 要

從晚清過渡到民國的傳統詞人劉毓盤，其《詞史》作為中國第一本通代詞史，乃嘗試對千年詞壇作出系統梳理與規律把握；此外，他尚撰有《中國文學史》，輯有《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華路藍縷之功，值得關注。然劉毓盤逝世八十多年後，才陸續出現幾篇論文開始關注他，其“身後名”長期備受冷落，與其生前作為構成強烈反差。本文嘗試進入20世紀30年代的詞學氛圍，並以學術史與教育史的眼光探討為何劉毓盤長期被學界輕視；繼而重新挖掘劉毓盤被學界輕視的詞學貢獻，分別是：《詞輯》與《詞史》的文獻積累為後世詞籍整理提供便利，《詞史》多面向而客觀的理論框架為後世詞史撰寫提供借鑑，《詞史》有效推動傳統詞學向現代詞學轉型。本文同時關注劉毓盤當年盡責而靈動的課堂傳授，旨在反思側重學術研究而輕視課堂傳授的大學趨勢，是否有調整的需要；並藉著《詞史》反思愈趨“理論化”的學界，如何在理論闡發與詞史描述的張力之間取得平衡。

關鍵詞：劉毓盤 《詞史》 《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 《中國文學史》 中國詞學現代化進程

^{*} 本文於2014年撰成，筆者先後得到陳平原教授、周建渝教授以及匿名審稿人的修改意見，獲益甚多，謹致謝忱。

一、引言

清末民初，隨著西學東漸，中國學術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同是傳統詞學向現代轉型的過渡期。在中西拉鋸、新舊激蕩之間，中國第一本通代詞史——劉毓盤的《詞史》，終在新文化運動浪潮中矚目誕生；此外，劉氏尚撰有《中國文學史》，輯有《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華路藍縷之功，值得關注。然而，劉毓盤頗受忽視，相關研究不多，主要見於沙先一《論劉毓盤的詞學思想及其詞史研究之貢獻》，¹該九千餘字論文屬導讀性質，對其人其書進行多層面概述，廣度有餘，深度略不足。其後有幾篇論文都在沙文基礎上，²稍加拓展，但都是三四頁篇幅，其論多有所限。此外，尚有二篇不是以劉毓盤為中心，但涉及到他的論文，其一是陳平原《知識、技能與情懷（上）、（下）——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³該文以教育史眼光，花了部分篇幅追憶劉毓盤的課堂魅力與趣味傳承。其二是陳水雲《浙江江山劉氏與清末民初詞學》，⁴該文稽考劉氏家族於晚清民初的詞學活動如何因應時代需要而轉型。本文擬在前賢基礎上，嘗試進入 20 世紀 30 年代的詞學氛圍，並以學術史與教育史的眼光探討為何劉毓盤長期被學界輕視，個中原因對於觀照偏重學術研究而輕視課堂傳授的大學趨勢，當能帶來啟發。本文繼而把視角擴展到整個學術思潮，重新挖掘劉毓盤被學界輕視的詞學貢獻，並釐探其著作在中國詞學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發揮著承先啓後的過渡作用。

-
- 1 沙先一：《論劉毓盤的詞學思想及其詞史研究之貢獻》，發表於“2010 年西安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該文後來成為《詞史》的《導讀》，見劉毓盤著，沙先一導讀，毛文琦校點：《詞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2 董凱揚：《劉毓盤的詞集輯佚研究》，《赤峰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7 期（2012 年 7 月），頁 92—94。董凱揚：《劉毓盤〈詞史〉的詞學成就》，《學理論》第 20 期（2012 年），頁 180—181。李劍亮：《劉毓盤與民國詞壇》，《常熟理工學院學報》第 3 期（2014 年 5 月），頁 77—81。
 - 3 陳平原：《知識、技能與情懷（上）、（下）——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北京大學學報》第 46 卷第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97—118；《北京大學學報》第 47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33—151。
 - 4 陳水雲：《浙江江山劉氏與清末民初詞學》，《浙江大學學報》2012 年第 4 期，頁 180—188。

二、從世代文儒到大學教授：劉毓盤及其著作

劉毓盤(1867—1927)，字子庚，號椒禽，浙江江山人。出身書香世家，其父劉履芬(1827—1879)，曾主持江蘇書局，家中藏書甚豐，著有《古紅梅閣集》、《鷗夢詞》。劉履芬與晚清詞家多有交往，且熱心編纂詞學文獻，宋翔鳳《樂府餘論》、孫麟趾《詞逕》皆賴其重刻以存世。劉毓盤叔父劉觀藻(1829—1880)，亦工詞，有《紫藤花館詩餘》。劉毓盤幼承庭訓，飽覽典籍，留心詞學，弱冠即擅詩詞，嘗親炙晚清詞家潘鍾瑞與譚獻，且與鄭文焯、曹元忠、王鵬運、朱祖謀、吳昌綬等詞壇名宿多有交流，從而奠定其詞學志業。光緒二十三年(1897)，劉毓盤得拔貢，後屢應朝考，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姑膺拔萃科，得陝西知縣。辛亥革命(1911)後，劉毓盤自陝返蘇，曾襄浙江圖書館事，其間得見文瀾閣藏書，後執教浙江省立第二中學，錢南揚、趙萬里、徐震堉等皆為劉毓盤此時學生。劉氏繼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來為《詞史》校訂出版的曹聚仁、查猛濟，即為劉毓盤此時弟子。1919年，劉毓盤到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主講詞史、詞選、詞家專集、詩文名著選、中國文學史等課程，於1927年病逝，享年60歲。⁵

劉毓盤文學與著述兼善，詞著有《噙椒詞》(又名《濯絳宦詞》)，今存清宣統二年(1910)刻本，駢體文著有《濯絳宦文鈔》，今存民國七年(1918)鉛印本。其學術著述今存《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今圖書店，1924)、《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北京大學1925年排印本)、《詞史》(上海：上海群眾圖書公司，1931)；(上海：上海書店，1985)，後者據前者複印。據其弟子查猛濟《江山劉先生遺著目錄叙》⁶所述，劉毓盤尚有《詩心雕龍》、《詞心雕龍》、《詞學斟注》、《詞律斟注》、《詩餘宮調名考》等著作，惜早年燬於戰亂。此外，據筆者閱讀所知，劉毓盤曾有詩集面世，《復堂日記》：“亡友江山劉彥清嗣子毓盤子庚有

5 參沙先一：《詞史·導讀》，頁1—3。

6 查猛濟：《江山劉先生遺著目錄叙》，載劉毓盤：《詞史》(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頁1—2。

《槿香館詩》，頗欲唾棄凡近。”⁷ 此集今似散佚，無從得見。下文將圍繞《中國文學史》、《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以及《詞史》展開論述。

三、劉毓盤的課堂傳授與詞學著述

(一) 劉毓盤的教學

民國時期，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發生遽變，隨著科舉被廢除，從前被視為“小道末技”的詞體也堂而皇之地踏進教堂，當時大學多設有詞學課程。劉毓盤先後執教浙江省立第二中學、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更成為北大文學院的詞學教授，其多年教學生涯雖無影像紀錄，但尚能端賴眾學生的集體追憶，讓我們重回“課堂現場”。豐子愷《瑣記》嘗記載：“我十六七歲時，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求學，國文教師劉子庚先生教我們這兩首散曲，一讀就熟，至今不忘。”⁸ 作家梁遇春《致石民的信》回憶道：“他（劉毓盤）是弟所愛聽講的教授，他教詞，總說句句有影射，拿了許多史實來引證，這自然是無聊的，但是他那種風流倜儻的神情，雖然年屆花甲了，總深印在弟心中，弟總覺得他頗具有中國式名士之風，總勝過假誠懇的疑古君及朱胡子等多矣。”⁹ 徐鑄成《舊聞雜憶》嘗追憶：“教詞曲學的劉毓盤先生，那時年已近古稀，但教授也非常認真，他對這一門造詣之深，大家認為是超邁前人的”。¹⁰ 陸宗達《我的學、教和研究工作生涯》云：“北大的課分三個專業：文學專業、語言專業和文獻專業，我選的課以語言專業為主……同時也選一部分文學課，印象最深的有兩門：一是劉毓盤先生的詞學，分詞律、詞選和專家詞三部分，還要求選課的人每兩周交一篇自填的詞。劉先生對我的詞很賞識，1927年，我去了東北，聽說劉先生還問起我：

7 譚獻著，范旭侖、弁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78。

8 豐子愷：《瑣記》，載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文學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763。

9 梁遇春：《致石民的信》，載吳福輝編：《梁遇春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頁190。

10 徐鑄成：《舊聞雜憶》（沈陽：遼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2。

‘陸宗達怎麼好久不見，他填的詞我一讀就認得出來！’¹¹ 翻譯家石民《應徵的自述》傳神地追憶：“劉先生是有名的詞學專家，也許正因為是專家的緣故罷，他講解詞，好比毛公說《詩》，無非美刺，王注《楚辭》，盡屬寄託似的，實在迂拘得可以。然而他的考試辦法一點也不迂拘，只要你填一首詞就是，既不限定題目，也不限定詞調，更不限定時間，你可以預先作好，按照考試時間表上的規定鐘點到堂上去，用發下的試卷謄正呈交”。¹² 錢南揚《回憶吳梅先生》滿懷感恩說：“（北大）四年正科是選科制……先後選修了許守白（之衡）先生的戲曲史及其他與戲曲有關的課程，如劉子庚先生的詞史……劉子庚先生見我有志於戲曲一門，便修書給吳先生，請他把我列諸門牆。”¹³

當然，諸學生都會因應其際遇、學養、性情、胸襟的不同而作出主觀的片段式追憶，若奢求忠實還原當時課堂情況實不太可能；然而，上述追憶不唯無抵觸之處，且都呈現出類似性內容，應不會偏離實際情況太遠，現把上引的集體回憶歸納為三點。其一，劉毓盤頗受晚清常州詞派影響，愛談比興寄託。他在課堂上常把詞體附庸《詩》、《騷》比興原則，把男女哀樂的意象視為政治寓託，不免迂拘。其二，重視寫作訓練，強調趣味傳承。作為傳統詞人的劉毓盤，他比較關注學生能否填詞，其考試方法是以填詞優劣作為衡量成績的基準，而且會銘記傑出表現的學生。其三，學生對其教學表現與學養性情評價頗高。劉毓盤是校園裏的詞學權威，其造詣之深，頗受學生認可，他不唯授課認真，課堂外也願意提攜學生，頗有中國名士之風，深受學生愛戴。整體來說，除了石民的追憶是稍帶譏諷外，其他學生都頗緬懷這位老教授的課堂教育。

（二）吃力不討好：劉毓盤被學界輕視的學術原因

1933年，邱竹師於《詞學季刊》指出劉毓盤備受忽視的現象：“劉先生於詞，

11 陸宗達：《我的學、教和研究工作生涯》，載《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65。

12 石民：《應徵的自述》，《宇宙風乙刊》第43期（1941年4月），頁3—5。

13 錢南揚：《回憶吳梅先生》，載趙景深主編：《戲曲論叢》第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

所詣在況蕙風、王靜庵上，而今日者況、王名滿詞壇，劉反晦而無聞。”¹⁴姑且不論劉毓盤的詞學造詣是否超過況周頤與王國維，邱氏指出劉氏未能獲得詞壇重視則符合事實。然而，劉毓盤生前嘗自負地道出：“我‘文’不敢自信，‘詩’也不過是第二流的作者，‘曲’暫且放棄給我們學生吳梅（癸安）去‘稱皇作主’，講到‘詞’，那是老實不客氣了”。¹⁵這種自信引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議題，劉毓盤傳統根柢紮實，也不乏詞學著作，而且是一位授課認真而頗受學生擁戴的好老師，為何得不到應有的關注與研究，乃至於被當時學界“看不起”（詳後文）？更為諷刺的是，劉毓盤死後60年，即1987年，因為《魯迅日記》曾記載當年劉毓盤惠贈魯迅詞集一事，引起魯迅研究專家李辰的興趣，始撰文粗略介紹劉毓盤的詞作。¹⁶即便是現代研究者，當他們總結20世紀的詞學研究時，大都只草草簡述其《詞史》具開創之功。¹⁷更甚者，筆者翻看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曹辛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詞學卷》、曹辛華與張幼良合著《中國詞學研究》、曾大興《詞學的星空——20世紀詞學名家傳》、曾大興《20世紀詞學名家研究》、李劍亮《民國詞的多元解讀》等專研近現代詞學之著作，發現諸書對部分名家皆有精彩的研究，卻沒有對劉毓盤其人其詞進行闡釋，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一直到最近，劉毓盤逝世八十多年後，才陸續出現幾篇論文開始關注他，其“身後名”長期備受冷落，與其生前作為構成強烈反差，為甚麼會這樣？要回答這個學術史問題，必須嘗試進入20世紀30年代的詞學氛圍方能理出脈絡。

整體來說，蓋有三個學術原因導致劉毓盤長期被學界輕視。首先，劉毓盤的三部著作都先後被當時學界“看不起”。劉毓盤於己亥年（1899）開始輯佚詞集，¹⁸經

14 邱竹師：《附識》，《詞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33年12月），頁48。

15 見查猛濟：《劉子庚先生的詞學》，《詞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33年12月），頁43。

16 李辰：《劉毓盤和他的〈濯絳宦詞〉》，《魯迅研究月刊》第8期（1987年），頁12—14。

17 如曹辛華：《詞史的編撰與詞學批評的“現代化”進程》，《中國韻文學刊》第1期（2000年），頁22。

18 劉毓盤：《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自序》：“己亥春，始輯詞以爲之助。”筆者未見該書的北大排印本，然施鵬存編的《詞籍序跋萃編》錄有此書之序，見《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740。

27 年不斷搜檢殘稿，遂於乙丑年（1925）¹⁹輯成《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下文簡稱《詞輯》）。該書自《李翰林集》起，至《高麗人詞》終，輯有六十種詞集，當中不乏善本。劉氏每輯一集，都附有跋語，嘗曰：“每一種成，則仿提要法，或尚論其人，或旁證其間，新知舊說，唯意欲言。”²⁰於詞壇理應有輯佚補遺之功，然此書卻陸續為詞學家訾議。1931 年，古文獻學家趙萬里《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提要》批評此書“真偽不分，校勘不精，出處不明，使人讀之如墜五里霧中”。²¹此批評後來為秋蓬沿襲，並於當時“研究重鎮”《詞學季刊》指責《詞輯》：“真贋雜糅，未為精審。”²²骨牌效應般，後來龍榆生《唐宋金元詞鈎沉序》對《詞輯》也有微言：“真贋雜糅，抉擇未精。”²³乃構成了一系列“陳陳相因”的類似性批評。據此，劉毓盤弟子查猛濟於 1933 年撰二文至《詞學季刊》替乃師抱不平：“（《詞輯》）較王靜庵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內容豐富得多，當時原是含有輯佚的作用，所以不免真贋雜糅，但中間頗有很好的材料。”²⁴“（《詞輯》）志在輯佚，是以網羅放闕，有美必搜，貴刊介紹敝鄉趙萬里君所校輯宋金元人詞中，病其真贋雜糅，似有未當，尚乞重加品題。”²⁵然而，此番言論在學界眼中不過是弟子過譽之辭，再加上查猛濟本身非詞學家，其看法自難與趙萬里、秋蓬、龍榆生的“專業意見”抗衡，以致劉毓盤的《詞輯》一直為學界輕視。事實上，趙萬里並非無的放矢，他曾具體而微地指出《詞輯》之謬：“編中收《金荃詞》據海源閣本，《荊台備稿》據宋刻本，《舒學士詞》據天一閣本，皆在可疑之列。《柯山詞》、《月岩集》據文瀾閣本，《秋崖詞》、《碧澗詞》據關中圖書館本，而不悟其皆出後人所輯。而《柯山詞》且收贋作，尤非先生所及料。《宣懿皇后集》

19 劉毓盤：《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自序》：“二十七年中，所成就祇此，著書之難，其信然哉。”“乙丑秋，江山劉毓盤子庚氏自序。”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 740。

20 劉毓盤：《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自序》，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 740。

21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提要》，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 741。

22 秋蓬：《詞籍介紹》，《詞學季刊創刊號》（1933 年 4 月），頁 215。

23 龍榆生：《唐宋金元詞鈎沉序》，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 747。

24 查猛濟：《劉子庚先生的“詞學”》，頁 46。

25 查猛濟：《與龍榆生言劉子庚先生遺著書》，《詞學季刊》第 1 卷第 3 號（1933 年 12 月），頁 187。

據《四朝名賢詞》本,而余所見明鈔本《四朝名賢詞》則無之,而不悟其即出《焚椒錄》。《黃華居士詞》、《疏齋詞》,云并據常熟瞿氏藏本,然瞿氏固無此二書也。細按之,知即本《中州樂府》與《天下同文》。至卷後附跋,亦泥沙俱下,紕謬時見。”²⁶要之,在30年代的詞學家與文獻學家看來,輯佚學講求的是“審慎準確”,以此準則衡量《詞輯》,該書大抵不合格。

此外,劉毓盤的《詞史》與《中國文學史》雖然沒像《詞輯》為學者連番批評,但同樣未能獲得當時學界的看重。民國以降,劉毓盤從傳統書院登進大學講壇,不得不適應現代的分科教育,加上在西方文藝觀念籠罩下,以“文學史”名義對中國文學進行系統化的研究蔚然成風。劉氏既受思潮熏陶,也為了授課需要,編撰《詞史》一書作為大學講義,稿件陸續(1926—1928)發表在《東北大學周刊》,其間屢有增刪潤飾,精益求精。整個成書過程就如劉師培《中國古文學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樣,皆因為編撰講義的需要而催化為學術著作,體現出那個時代“教”“研”合一的特殊背景。劉氏逝世後,其弟子曹聚仁、查猛濟整理其定稿,於1931年由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詞史》全書有十一章,共二百多頁,皆用文言書寫,是中國第一本通代詞史,旨在勾勒千年詞史的大概脈絡與演進歷程。1933年,秋蓬雖然在《詞學季刊》稱譽《詞史》作者“既具相當根柢,亦時有獨到之見……徵引之繁博,文筆之清雅”;然而,秋蓬同時指出該書“編製未甚精密,又詳於枝葉瑣屑,而忽於正變源流,使人閱之不能如網在綱,有條不紊”,²⁷一定程度質疑《詞史》能否系統梳理千年詞史的嬗遞,評價不怎麼高。

至於劉毓盤的《中國文學史》(原名《中國文學略》),似乎不具備引起當時學界討論的影響力。原因很簡單,劉毓盤來北大前,已撰成《中國文學史》,後來他為北大開設“中國文學史”,很有可能將此書作為課堂講稿,但全書僅有61頁,乃粗分為“文略”、“詩略”、“詞略”、“曲略”四大部分,²⁸輔以“綱目體”予以

²⁶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提要》,載施蛸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741。

²⁷ 秋蓬:《詞籍介紹》,《詞學季刊》第1卷第2號(1933年8月),頁204。

²⁸ 劉毓盤:《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今圖書店,1924年)。

簡述，粗略如此，焉能涵蓋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學？雖然查猛濟極力吹捧此書“鈎元提要，無美不賅，時或采別醇駁，間亦參以己見，其論斷之眼光，則尤合於現代批評文學之旨焉”，²⁹但這明顯是門人過譽之見。事實上，要獨力完成一本文學通史談何容易，學養醞釀與研究積累缺一不可，但那時候“文學史”的撰寫熱潮尚屬草創實驗期，故劉毓盤《中國文學史》的學術質量顯然比不上後來精研而成的《詞史》，是以粗糙的《中國文學史》自難獲得學者們的重視。

劉毓盤長期被學界輕視的另一原因是：其詞集乏人研究、填詞不等於學問。劉毓盤作為傳統詞人，著有《嶠椒詞》，他曾自負地說：“凡載在這冊子裏的詞，沒有一首不能按之管絃的。”³⁰後來嘗與劉毓盤交往的曲學家吳梅，其《蠡言》也稱譽其詞：“子庚工於倚聲，一字不肯苟且。”³¹說明其詞理應受到學界關注。然而，劉毓盤的身份頗為“尷尬”，他從晚清過渡到民國，應聘成為現代教育體系下的教授，外界多不以傳統詞家視之；加上在“一代有一代文學”之思潮下，晚清以降的舊體詩詞本來就不容易獲得注目，所以鮮有研究者以“文學遺產”的視角對劉毓盤詞集予以整理出版，導致其詞集研究迄今仍是空白，不像王國維等人除了研究詞學外，多有其他領域的學術建樹，連帶其詞獲得學界關注。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詞學的現代化進程中，研究者開始嚴格區分“詞的創作”與“詞的研究”這兩大區域。1930年，胡雲翼在《詞學ABC》即聲明，“我這本書是‘詞學’，而不是‘學詞’”，³²已有強烈區分兩者的意味。後來1933年，龍榆生《研究詞學之商榷》說得更清晰，“取唐宋以來之燕樂雜曲，依其節拍而實之以文字，謂之‘填詞’。推求各曲調表情之緩急悲歡，與詞體之淵源流變，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謂之‘詞學’”，並把詞學的學術研究方向劃分為“圖譜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聲調之學”、“批評之

29 查猛濟：《查序》，載劉毓盤：《中國文學史》，頁1。

30 查猛濟：《劉子庚先生的“詞學”》，頁44。

31 吳梅：《蠡言》，載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476。

32 胡雲翼：《詞學ABC》（上海：世界書店，1930年），頁2。

學”和“目錄之學”，³³當中偏沒有“填詞之學”。當詞學研究者嚴格區分“詞的創作”與“詞的研究”時，傳統的詞體創作僅屬文人雅士的業餘“消遣”，而不是學術體系內的“學問”。可見在中國詞學的現代化進程中，劉毓盤詞集既乏人研究，其填詞本領又稱不上是學問，自然淡出學界視野。

(三) 教育不等於學術：劉毓盤被忽視的教學貢獻

劉毓盤長期被學界輕視的最後一個原因是，課堂教育大抵不能作為“學術業績”。誠如前述，劉毓盤是一位授課認真而頗受學生擁戴的好老師，但在學界眼中，這些頂多是趣聞軼事，遠稱不上是學術成績，“回溯百年中國大學史，談及某某‘大師’，一般是以‘著述’為標誌。對於大學教授的‘正業’，即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其實沒有充分重視……在現代中國大學，教授在課堂上表現如何，只關涉茶餘飯後的閒談，很少作為評價人物的主要標準”，³⁴而且，更為現實的原因是“文字壽於金石，聲音隨風飄逝，當初五彩繽紛的‘課堂’，早已永遠消失在歷史深處。後人論及某某教授，只談‘學問’大小，而不關心其‘教學’好壞，這其實是偏頗的”。³⁵陳平原近年關注文學教育史，論之甚詳，此不贅言。這裏要指出的是，側重教育的老先生不一定會默默無聞，像顧隨便是一個例子，然這僅屬於少數，若非名聲大的葉嘉瑩不遺餘力去宣揚其課堂魅力，以及耐性整理其講稿，³⁶相信學術著作不多的顧隨也會“聲音隨風飄逝”。相反，劉毓盤就沒那麼幸運，他晚年雖致力教育，卻沒有招收任何詞學弟子，即使與他較為親近的門生曹聚仁、查猛濟，也非專研詞學，在詞壇缺乏“發言權”，而且兩人是劉毓盤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的學生，對於乃師後來在北大的教育情況並不瞭解，自然無從說起。

換言之，那時學界不會因為劉毓盤不俗的課堂表現，而重新評估他的學術

33 龍榆生：《研究詞學之商榷》，載《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87—103。

34 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中國文學學報》（2010年12月）創刊號，頁318。

35 同上，頁289。

36 顧隨著，葉嘉瑩筆記：《中國古典詩詞感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貢獻，這種教學不等於學術的問題，在當今大學體系其實更為嚴重。在講究大學排名、著重量化的學術體系下，不少大學教員為求“生存”乃至“晉升”，整天汲汲營營的不是在“備課”，而是在“寫論文”，因為課教得再好也沒有直接益處，反而頻繁發表論文才能“安身立命”，多留下著作才能獲學界關注。不妨說，產量比質量重要，研究比教學重要，這種教育與研究的緊張關係，一定程度違背了大學“傳道授業解惑”的重要使命。而且當研究者面對發表壓力時，往往會力求突破，論題都講究“求新”，但“新”不一定是“真”，“新見”不一定有“價值”，若研究者只把“新”的研究成果“順勢”傳授給學生，而忽視傳授較為重要的基礎學問，這種教學方法是否有點本末倒置？

這裏指出側重學術研究而輕視課堂傳授的大學趨勢，只想進一步突出劉毓盤的教學貢獻。當今大學教育，詩詞的傳授多採用知識積累的“文學史”教法，即便是教授也不一定能把詩詞幽微的藝術境界揭示出來，加上學生甚少賦詩填詞，大多對古典詩詞缺乏真正體會，只能根據教科書機械地說明杜甫詩是“沉鬱頓挫”、姜夔詞是“清空騷雅”，而缺乏自身的鑒賞能力與趣味判斷。回過頭來看，劉毓盤雖愛以比興寄託闡釋詞體，但他那不乏靈性、展現學養的課堂傳授，非但能揭示出詞體的深層意涵，且嚴格規定學生必須親身填詞，理論與實踐雙管齊下，很大程度能引領學生進入古典詩詞的精神世界，難怪引起學生們的集體緬懷。³⁷ 綜上，劉毓盤盡責地進行學術薪傳，重視技能訓練與趣味傳承，讓學生對古典詩詞有不錯體會，讓他們得以馳騁想像，浸潤詩情，這不就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教學貢獻嗎？但凡事總是一體兩面，“晚清以降，講授中國古代詩文，到底以知識傳授為主，還是兼及趣味與技能，是個難題，至今沒有很好解決”，³⁸ 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自是教學界需要不斷反思的議題，但劉毓盤當年認真而靈動的課堂傳授，對於調整當今僵化而功利的教育體系不無借鑑價值。

37 前引石民對劉毓盤的課堂追憶雖語帶譏諷，但任何一位老師的教學方法都難以滿足所有學生，不能以偏概全地認為劉毓盤的教學是平庸的。事實上，若沒有一定水平的課堂表現，其教學不太可能引起豐子愷、梁遇春、陸宗達、徐鑄成、錢南揚等名人的集體緬懷。

38 陳平原：《知識、技能與情懷（下）——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頁137。

四、大輅椎輪，創始不易：劉毓盤的詞學貢獻

上文闡釋了劉毓盤被學界輕視之原因。然而，一位畢生奉獻給詞學的傳統學人，其凝聚血汗的著作是否真的無甚價值？在中國詞學現代化進程中，當時學界對於劉毓盤的階段性成果會否稍欠“批評的距離”？下文擬重新挖掘劉毓盤被學界輕視的詞學貢獻。

（一）《詞輯》、《詞史》的文獻積累為後世詞籍整理提供便利

劉毓盤的《詞輯》於輯佚學具草創之功，不無文獻積累的詞學價值。晚清以降，詞的輯佚學始成規模，1917年，朱祖謀《彊邨叢書》除了彙整宋金元詞集外，也搜補7種佚集。稍早的1908—1909年間，王國維《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輯得唐五代21家共684闕佚作。1925年，劉毓盤《詞輯》輯得60種唐宋金元詞佚集，比起前兩者較具規模。整體來說，朱祖謀的輯佚失之少，王國維的輯佚失之窄，劉毓盤的輯佚失之粗。及至1931年，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輯得70種宋金元佚集共1500多闕詞作，此書以體例精審，搜補繁富見稱，極具學術價值。然而，輯佚本來就類似“滾雪球”的學問，先行者“手無寸鐵”，缺乏文獻積累，難免粗疏闕誤；後出者“坐享其成”，大抵轉精益繁。若只給予最後製成品贊美，而忽略當初開山者的披荆斬棘，則失之偏頗。誠然，趙萬里得以順遂完成其大作，《詞輯》不無發揮文獻積累的功效，是以趙氏雖然批評《詞輯》“真偽不分，校勘不精，出處不明”，然同時指出“大輅椎輪，創始不易，後之鑒者，自當為先生諒也”。³⁹同樣地，龍榆生對《詞輯》批評之餘，也認識到此書的價值：“海寧趙斐雲君，繼茲（《詞輯》）有作，遂成《校輯宋金元人詞》……詞林輯佚之功，於是燦然大備矣。”⁴⁰說明趙萬里是在劉毓盤的基礎上進行輯佚，先行的《詞輯》不無草創之功。直到1965年，唐圭璋站在一個恰當的“批評距離”，較

39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提要》，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741。

40 龍榆生：《唐宋金元詞鈎沉序》，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747。

能客觀地評價《詞輯》，他指出此書雖有紕繆，然若“沒有這些成果，《全宋詞》的編輯工作就會困難得多”，⁴¹乃肯定《詞輯》具文獻積累的學術價值，後世的詞籍整理不無從中獲得沾溉。

至於劉毓盤的《詞史》則具有彙整文獻的學科價值。劉氏出身書香門第，飽覽典籍，又經過長期輯佚以豐富其知識儲備，無疑為《詞史》的編撰奠定紮實的基礎。在典籍透明度低的年代，《詞史》不時旁徵博引，組織龐雜文獻，每能綜述詞籍、詞人、詞群、詞體、詞評等相關材料，殊為難得。例如《詞史》不唯對熱門的唐宋、清朝詞史進行梳理，更闢章對冷門的遼金、元明詞史予以闡述，資料引述相對翔實，可補充此領域研究的空白，極具詞學價值。而《詞史》的文獻彙整可細分為徵引、佐證、補遺、辨偽四方面。就徵引而言，《詞史》常徵引不同詞總集，並相互比對，以見增補狀況，遂按次第臚列該朝詞家別集，以資內文闡述。例如論清詞時，劉毓盤參考了王昶《清詞綜》、王紹成《清詞綜二編》、黃燮清《清詞綜續編》、丁紹儀《清詞綜補編》、孫默《清名家詩餘》、聶先與曾王孫《百名家詞》、王昶《琴書樓詞鈔》、繆荃孫《雲自在龕匯刻名家詞》、徐乃昌《閨秀百家詞》等詞總集，並據此列出一張相對完整的清詞別集目錄，供研究者按圖索驥；又例如《詞史》介紹李煜詞時，則密集徵引前人對其詞的評價，⁴²頗能信手拈來。就佐證而言，《詞史》不時組織各種文獻以印證其觀點，例如論無名氏《後庭宴》詞時，則博引詞牌文獻推論此詞當是五代人所作；⁴³論金朝文學時，則羅列詩歌總集闡明金朝詩詞多為漢人所撰。⁴⁴就補遺而言，《詞史》偶能

41 唐圭璋：《編訂說明》，見《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9。

42 “王世貞《四部稿》曰：‘《玉樓春》詞，致語也；《虞美人》詞，情語也。’是猶以常人論之也。蔡條《西清詩話》謂其《浪淘沙》詞曰：‘含思淒婉。’黃昇《花庵詞選》謂其《相見歡》詞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蓋其心愈悲，其詞愈苦矣。’蘇軾則非其《破陣子》詞。”劉毓盤：《詞史》，頁44。

43 “右無名氏《後庭宴》詞。按《詞苑》曰：‘宣和間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無名，後人名之為《後庭宴》云。又以《魚游春水》詞亦為唐人作。’考涉古本《草堂詩餘》，以《魚游春水》詞為阮逸女作，是出於北宋人矣。此詞前半與《踏莎行》同，後半截然各列，與毛熙震四十四字體之《後庭花》又無一相似處。唐人詞自《河傳》外，前後疊相去無如是之遠者，且‘眼中’句與前蜀後主‘柳眉桃臉不勝春’句法同，當是五代人所作也。”劉毓盤：《詞史》，頁51。

44 “元好問《中州集》錄二百四十六人。自完顏璫、耶律履二人外，則為漢人也。郭元釵《全金詩補》補一百十二人。自完顏匡、完顏奉國、朮虎遂、烏林達爽、溫迪罕某五人外，亦為漢人也。詞則《中州樂府》錄三十六人，自完顏璫、完顏文卿二人外，則亦為漢人也。”劉毓盤：《詞史》，頁129。

補輯詞人遺作與失收詞牌,例如爲李煜輯得佚作《柳枝》詞,⁴⁵又爲《欽定詞譜》補上詞牌《嵇康曲舞》,⁴⁶皆具文獻價值。就辨僞而言,《詞史》嘗試糾正一些舛誤,例如論敦煌唐寫本中的《天仙子》時,則比對唐宋時期不同詞體形式,繼而懷疑此詞非出於唐五代;⁴⁷論陳後主慢詞《秋霽詞》時,則以詞史的嬗遞眼光推論此詞當是後人僞托。⁴⁸這些判斷不見得全對,像《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認爲《詞史》將唐玄宗與李太白之詞都當真,則有失嚴謹:“唐明皇《好時光》本爲僞撰。李太白之詞,見于北宋以前者,僅《花間》序其《清平樂》而已,是否爲《清平調》之誤,尙難質言”,⁴⁹無論孰是孰非,《詞史》的文獻彙整對於後世進一步釐清傳世詞作的源頭與嬗遞都發揮著一定作用。

饒有傳統學養的劉毓盤,其文獻彙整尙屬草創嘗試,難免顯得粗糙,但先行者的文獻積累確爲後世研究者提供諸多便利。而且,《詞史》常以敏銳眼光對龐雜材料予以佐證與辨僞,若非對詞體內部特徵(詞樂、詞牌、詞律、詞韻)有深刻瞭解,實難作出上述判斷,高度體現出一位傳統詞人的看家本領。此番紮實功底是後世“審慎準確”的文獻學家普遍缺乏的,兩者應是互補長短,不應只苛刻地聚焦某方短處。

(二) 架構分明,不主門戶:《詞史》的理論框架爲後世提供借鑑

《詞史》作爲中國第一本通代詞史,劉毓盤《自序》期待此書能做到“綜其得失,以識盛衰”,⁵⁰旨在對千年詞史作出系統梳理與規律把握,雖然未能處理得

45 “右南唐後主《柳枝》詞。按《客座贅語》曰:‘後主嘗作《柳枝》詞,書黃羅扇上,以賜宮人慶妙,後亦流落人間。’乃得見之,本集不收,應補。”劉毓盤:《詞史》,頁46。

46 “右薛九《嵇康曲舞》詞。按《客座贅語》曰:‘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後主宮中。善歌《嵇康曲》,曲爲後主所製。江南平,流落江北,嘗一歌之,座人皆泣。後易爲《嵇康曲舞》詞,即此詞也。’《詞譜》不收,應補。”劉毓盤:《詞史》,頁57。

47 “右無名氏《天仙子》詞。按唐五代人《天仙子》詞祇一疊,或叶平韻;或首二句叶仄韻,第三句起換平韻叶;第二句平起仄起可不拘。至宋人方如後疊,專叶仄韻,第二句平仄同首句。此詞與唐五代人詞不合,惟既云出於唐寫本,猶以爲疑也。”劉毓盤:《詞史》,頁35。

48 “唐五代人無專以慢詞著者,《草堂詩餘》錄陳後主《秋霽詞》一百四字體。《詞律》以爲後主於數百年前,何以先知有此體,其爲僞托無論已。”劉毓盤:《詞史》,頁70。

49 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795。

50 劉毓盤:《自序》,載《詞史》,頁2。

很圓融，然其草創嘗試對後世的詞史撰寫不無啓迪。在架構層面，《詞史》樹立以“綱目”結合“外部”與“內部”的論述範式，此理論框架至今尚存參酌價值。就“綱目”而言，《詞史》章節共分十章：“論詞之起初由詩與樂府之分”、“論隋唐人詞以溫庭筠爲宗”、“論五代人詞以西蜀南唐爲盛”、“論慢詞興於北宋”、“論南宋詞人之多”、“論宋七大家詞”、“論遼金人詞以漢人爲多”、“論元人詞至張翥而衰”、“論明人詞之不振”、“論清人詞至嘉道而復盛”。此綱舉目張的架構，從詞的起源與特徵一直論述到清詞復興，具有考鏡源流的現代色彩，其敘述框架也非鐵板一塊，而是因應不同朝代的詞壇特徵作出相應調整。及至《結論》部分，劉毓盤再次歸納千年詞史的盛衰歷程：“詞者詩之餘，句萌於隋，發育於唐，敷舒於五代，茂盛於北宋，煊燦於南宋，剪伐於金，散漫於元，搖落於明，灌溉於清初，收穫於乾嘉之際。”⁵¹這一前一後的論述，除了認爲“清人詞至嘉道而復盛”與當今詞史描述稍有偏差外，⁵²其他章節描述大致契合中國詞史的興衰因革，且能先後抓緊各朝代最鮮明的詞壇面貌，例如“花間鼻祖”溫庭筠，其詞無論是量與質都得以獨步隋唐，值得被“經典化”，所以《詞史》“論隋唐人詞以溫庭筠爲宗”頗能切合當時詞壇，拿捏相當精準。但這種宏觀把握非一蹴而就，早在《詞史》前，劉毓盤在《中國文學史·詞略》就嘗試以綱目體梳理中國詞史，⁵³其描述雖然相當簡略，但勉強勾勒出詞壇發展的基本面貌。而且仔細比對《詞略》與《詞史》，不難發現前者的論述很多轉化至後者，例如《詞略·慢詞之初起》，僅簡述柳永嘗推動長調創作；⁵⁴後來《詞史·論慢詞興於北宋》則花較多篇幅釐探同一觀點。⁵⁵可見劉毓盤得以宏觀把握千年詞史的脈絡，是

51 劉毓盤：《結論》，載《詞史》，頁213。

52 詞學研究者普遍認爲詞復盛於清初，非嘉道年間。可參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7—10。

53 其綱目分別是：“樂府之鉤元”、“協律之改字”、“歌辭之流行”、“字義之索解”、“借題之發舒”、“句法之變易”、“詞體之初起”、“小令之初起”、“雙疊之初起”、“詞集之初起”、“近詞之初起”、“慢詞之初起”、“大晟之正宗”、“詞家之別派”、“白話之入詞”、“詩詞之分界”、“閨閣之多才”、“詞學之極盛”、“國外之采風”、“中聲之僅見”、“正軌之將亡”、“彈詞之別出”、“新體之紛更”、“圖譜之妄作”、“變雅之未成”、“詞律之改正”、“倚聲之名家”、“音節之略說”。見劉毓盤：《中國文學史》，頁38—50。

54 劉毓盤：《中國文學史》，頁44。

55 劉毓盤：《詞史》，頁68—69。

長期以來大量掌握文獻與反覆思考積累而成的。

就“外部”而言,可分為兩點。其一是《詞史》關注各朝詞壇發展如何深受政治制度與文學思潮影響。如論唐五代詞之盛源於“其時君唱於上,臣和於下,朝野恬嬉以相娛樂”⁵⁶的享樂氛圍;論北宋慢詞成風是因為“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⁵⁷的盛世推動;論元朝曲盛而詞衰是因為文人受制於“詞曲取士之法,取曲而不取詞”⁵⁸的科舉制度;論明詞之不振,乃歸咎於明朝的高壓政策、言不由衷的科舉限制、詞曲相混的文學現象、韻律舛誤的通俗詞譜。⁵⁹ 這些判斷至今仍經得起推敲,值得深入闡釋。其二是《詞史》嘗試系統歸納詞人群體。文學群體向是構成“文學史”的關鍵要素,劉氏敏銳察見詞人群體對詞壇建構的重要性,如論五代詞關注到西蜀與南唐詞人群;⁶⁰論北宋詞歸納出蘇門六君子;⁶¹論清詞留意到浙西派、常州派、吳中七子詞人群。⁶² 此外,《詞史》論南宋詞人時,更系統化按階級高低排列皇帝、宗室、宰相、將帥、武臣、大儒、布衣、方外、閨媛、妓妾、仙鬼、賊寇等詞人群,⁶³並條理分明地展開闡述。再者,《詞史》不時關注到遺民詞人,如論金元易代之際,則把心繫故國、誓不當貳臣的段克己、李俊民定位為金人,⁶⁴頗能體現出劉毓盤筆底下的同理心。

就“內部”而言,也可分為二點。一是《詞史》細緻辨析詞體的音律形式。詞本是音樂文學,《詞史》不時論及四聲韻律的議題,最明顯的是第一章“論詞之起初由詩與樂府之分”。他嘗試把詞體的形式特質與音樂特徵溯源自新體樂府、舊體樂府,乃至《詩經》、《楚辭》,藉此縱向聯繫,總結出“《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樂府,樂府之不能不降而為詞者,亦勢也”。⁶⁵ 此番論述雖然忽視隋唐

56 劉毓盤:《詞史》,頁42。

57 同上,頁69。

58 同上,頁147。

59 同上,頁169,184。

60 同上,頁41—60。

61 同上,頁76—77。

62 同上,頁200,204,206。

63 同上,頁90—103。

64 同上,頁144—145。

65 同上,頁15。

“燕樂”對詞體產生的重要性，且屬拾清人牙慧，⁶⁶不算甚麼新見；然而，劉毓盤花大量篇幅系統辨析詩歌體系的曲調淵源及嬗遞歷程，對當今普遍缺乏音律認知的研究者來說，仍具參酌價值。其二是《詞史》對名家詞作之鑒賞。《詞史》臚列大量名家詞，或徵引前人鑒賞，或道出個人感悟，務求揭示其奧妙之處，具有指導學生創作的意味。例如《詞史》評溫庭筠為“極長短錯落之致矣，言詞者必奉以為宗”，⁶⁷指出溫詞極盡婉曲深致之能事，能體現詞體作為異於詩體之特美，習詞者當以此為臨摹對象；《詞史》評李煜為“於富貴時能作富貴語，愁苦時能作愁苦語。無一字不真，無一語不俊”，⁶⁸則秉持“知人論世”傳統，闡明後主不同際遇的藝術表現，並揭示創作真諦在於性靈抒發；《詞史》評張炎為“猶及見臨安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蒼涼激楚，即景抒情，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不徒以裁紅刻翠為工焉”，⁶⁹說明經歷亡國之痛的張炎，其詞不無盛衰寓託，顯得沉鬱蒼涼，即“國家不幸詩家幸”的詩歌規律。這種詞作鑒賞雖然多是沿襲或櫟括前人詞話，無多新見，不過此書本來就具有“教育”性質，擷取前賢最為精闢的話語去教學，實屬常情，不應過分訾責。

《詞史》另一詞學貢獻在於破除門戶之見。清代詞派，多有門戶之見，粗略而言，就是南北宋之爭，像浙西派力主南宋醇雅詞風，常州派崇尚北宋婉麗詞風，晚清詞壇雖有調和趨勢，然門戶成見仍不時呈現。⁷⁰民國時期，即使是胡適、胡雲翼等現代學人，亦存主觀成見，諸人普遍推崇北宋詞，貶抑南宋詞（詳後文）。劉毓盤雖時受常州派遺風影響，但在具體編寫時，能客觀地從歷史高度把握南北宋的詞史嬗遞。劉氏《詞史·自序》不滿清朝詞壇“文人弄筆，僅

66 如汪森《詞綜序》：“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蕭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載張璋等人編：《歷代詞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923。此外，類似之說法，尚見於王世貞《藝苑卮言》、顧炎武《日知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等，茲不詳引。

67 劉毓盤：《詞史》，頁40。

68 同上，頁46。

69 同上，頁120—121。

70 詳見孫克強：《清代詞學的南北宋之爭》，載《清代詞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5。

在一字之工,然而浙派、常州派之分,即由之而起。雖曰各有可取,亦無謂之爭矣”,⁷¹認為諸詞派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其意氣之爭不無偏頗。藉此反省,《詞史》以開闊的視野道出“不知南宋詞即出於北宋,特時代之有先後耳……故曰北宋之詞大,南宋之詞深,時爲之,亦勢爲之爾”,⁷²持平道出南北宋詞各擅勝場,與其《結論》言詞“茂盛於北宋,煊燦於南宋”之判斷遙相呼應,重申南北宋詞的差異只是時代有先後,若據此定優劣自是不妥。《詞史》更進一步說明宋詞從“大”轉化爲“深”是因爲南宋政壇“文網愈嚴,則詞意愈晦”,⁷³頗能結合外緣的政治背景予以闡釋。事實上,《詞史》非但闢章以均衡篇幅論述北宋、南宋詞,論及清詞時,也持平勾勒出浙西、常州詞派的演進脈絡,無明確的門戶成見,這與其《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自序》之立場如出一轍:“浙派主協律,常州派主立意,溝而通之,斯得矣。”⁷⁴整體來說,《詞史》除了稍爲拔高清朝的“吳中七子”外,⁷⁵其他論述大抵公允,這種分寸感體現出劉毓盤清醒的現代詞觀。

《詞史》首次對千年詞史進行客觀描述與系統梳理,並建構出一個多面向的理論框架,具現代學術色彩;但此舉畢竟屬草創嘗試,自不乏疏漏,也非新見迭出,誠如秋蓬所云“編製未甚精密”,然其開創之功實不可沒。近人楊世驥《文苑談往》云:“詞的產生雖有一千年的歷史,而向無一部系統地評述的專著,有之,則以他的這部《詞史》爲嚆矢,其價值殆無異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在曲一方面的地位。”⁷⁶誠然,開山者的披荊斬棘對於後世的詞史撰寫無疑具有指導作用,批評者應給予適當的同情理解。

71 劉毓盤:《自序》,載《詞史》,頁2。

72 劉毓盤:《詞史》,頁61。

73 同上。

74 見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頁739。

75 《詞史》判斷“清人詞至嘉道而復盛”,較重視其時的吳中七子,是有其原因的。劉毓盤是劉履芬之子,劉觀藻之侄。劉履芬、劉觀藻爲浙江江山人,生於浙,而長於吳中,對吳中七子頗爲推崇。家學影響潛移默化,使劉毓盤對吳中七子講求格律之風亦有承襲,詳見沙先一:《清代吳中詞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頁212—214。

76 楊世驥:《文苑談往》,《新中華》第1卷第6期(1943年),頁138。

(三)《詞史》作為中國詞學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座“橋樑”

西方文藝科學觀輸入中國後，傳統文體如詩文、戲曲、小說都能在西方找到對應樣式，而接受現代化“衝擊”，唯獨詞體找不到可供對照的西方樣板，所以穩定性較強，其現代化進程相對滯後。晚清以降，以“文學史”名義對中國文學進行系統歸納與客觀描述的研究蔚然成風，各種文學通史、斷代史、分體史、專題史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滋長，唯獨詞史論述差點被排除在“文學史”視野之外。1910年，詞的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認可，例如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黃人《中國文學史》，在論及宋代文學，都只談宋詩不談宋詞。及至1914年，王夢曾《中國文學史》始把詞體納進文學史，可見詞學的現代化進程相對滯後。⁷⁷一般認為，現代詞學的成熟期是奠基於三十年代以降，由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等專攻詞學的學者群策而成。在此之前，嘗試推動傳統詞學向現代轉型的先驅者可粗略分為兩大派：一是傳統詞家，可稱為“舊派”；二是現代研究者，可稱為“新派”。⁷⁸

“舊派”傳統詞家指的是朱祖謀、吳昌綬、陶湘繼等晚清遺老，他們不屑西方的文藝科學觀，繼續對舊體詩詞進行鑒賞品評、創作唱酬，但他們同時致力文獻整理，有功於現代詞學的建構。像吳昌綬在民國時期陸續刻印《雙照樓景刊宋元本詞十七種》，保存不少宋人刻本。此外，朱祖謀於晚清潛心校對《夢窗詞集》，更在1917年輯成規模宏大的《彊村叢書》，輯錄唐宋金元詞集173種。1917—1923年，陶湘繼先後匯刻成《涉園續刊景宋金元明本詞二十三種》，當中不乏罕見善本。這些文獻著作為現代詞學的“校勘學”樹立範式，取得矚目成就，難怪龍榆生《詞學研究之商榷》提到，“臨桂王鵬運與歸安朱彊村先生合校《夢窗詞集》，創立五例（詳四印齋本《夢窗甲乙丙丁稿》），藉為程期，於是言詞

77 參王兆鵬：《20世紀前半期詞學研究的歷程》，《文學遺產》，2001年第5期，頁106。

78 “舊派”與“新派”的分法，主要受嚴迪昌、劉揚忠、鍾振振、王兆鵬啟發，見《傳統、建構、展望——關於二十世紀詞學研究的對話》，《文學遺產》，1999年第3期，頁3—4。然該文也承認這種分法只是大致描述，兩者之間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異中有同，本文認同此觀點，並借此分法對當時詞壇作一整體描述。

者始有‘校勘之學’”，⁷⁹特意表彰王鵬運與朱祖謀等人為現代“校勘學”作出巨大貢獻，其操作方法為後世仿倣。稍作補充，諸遺老的校勘非逐字讎對而已，而是輔以熟諳四聲音律之長，斷定孰字為是，孰字為非，展現深厚功力，像朱祖謀就有“律博士”之稱。另外，王國維也可納進“舊派”詞家，其《人間詞話》頗受西方哲學與美學影響，揭示出一套藝術本位、哲理思維的詞學觀，不無中西合璧的學術氣象；然而，此書依舊是傳統“摘句體”的印象式批評，缺乏嚴密的邏輯推演。整體來說，“舊派”的文藝思想或研究方法雖受到傳統束縛，但傳統詞家的默默耕耘無疑為現代詞學奠定紮實的基礎。

“新派”研究者指的是指梁啟超、胡適、胡雲翼等民國學人，除胡雲翼外，諸人非精研詞學，只是擬把新文化運動的改革浪潮延至詞學，即所謂“但開風氣不為師”；雖然如此，諸人卻具備扭轉時代風氣的氣魄，有力推動傳統詞學向現代轉型。梁啟超著有《辛稼軒先生年譜》，並於《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諸文論及詞學，他主要以社會功能的標準稱譽豪放詞風，強調蘇、辛詞派的寫實能力與藝術成就，充分體現出其以文學作為救國利器的理念。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編有《詞選》，並著有《南宋的白話詞》、《詞的起源》等論文，對傳統詞學帶來極大衝擊。胡適在清人基礎上，⁸⁰進一步把詞的歷程分為“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與“詞匠的詞”，據此極力貶抑南宋典雅詞派，且以歷史進化論的眼光，把源自民間的詞看成是“白話文學”的典型，從而確認詞體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崇高位置。稍後的胡雲翼著有《宋詞研究》、《詞學ABC》、《中國詞史略》等，諸書集中探討唐宋詞的起源、發展、變遷、風格與思想，其詞學理念大抵沿襲胡適而後出轉精。整體來說，“新派”研究者過於標舉詞體的社會功能與白話特徵，所論難免偏頗；但在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時代感召下，他們傳播了一套理論，培養了一支隊伍，建立了一

79 龍榆生：《詞學研究之商榷》，載《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89。

80 王士禛將部分詞人分為“詩人之詞”、“文人之詞”、“詞人之詞”、“英雄之詞”，見《倚聲初集·序》，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729，頁1640；譚獻將部分詞人分為“才人之詞”、“學人之詞”、“詞人之詞”，見《復堂詞話》，載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4013。

套嶄新的研究方法，得以大幅提高詞體的文學地位。而且，在具體寫作過程中，諸人以酣暢的白話或半文言進行實證論述，高度體現出思辨性、系統性、說理性，擺脫了傳統文人零碎掇拾、印象發揮，而缺乏邏輯推演的評論模式，無疑催化了傳統詞學向現代轉型。

大體來說，“舊派”傳統詞家根柢紮實，然思辨性不强；“新派”學人思辨性强，然根柢不夠紮實。而現代詞學之所以成熟地建立在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諸人手上，不是因為他們如“舊派”般恪守傳統，也不是因為他們如“新派”般全盤西化，而是因為他們既有傳統根柢，又具現代思辨力，並把兩者高度融合。像龍榆生既熟諳詞體四聲音律，又能接受文藝科學觀，對詞史的演進歷程予以規律梳理。夏承燾既考據詞人生平事迹，又能系統辨析詞體的形式因革。唐圭璋既專精文獻整理，又能以學術話語揭示詞體美學價值。⁸¹ 所以本文認為，在中國詞學現代化進程中，劉毓盤的《詞史》既體現出傳統詞人的學養與趣味（鑒賞、文獻、音律、輯佚、辨偽、佐證），也體現出西方的文藝科學觀（理論框架、盛衰歷程、客觀描述），⁸² 一定程度是“舊學新知”的有機融合，無形中為詞學的轉型時期樹立出一條“正確”走向的路徑。不妨說，劉毓盤《詞史》嘗試以“傳統”學養結合“現代”意識，首次對千年詞壇進行系統描述，有效推動傳統詞學向現代詞學轉型，後世詞學家如龍榆生等人可穩健地走向彼岸，《詞史》就如“橋樑”般發揮著承先啓後的過渡作用。例如王易《詞曲史》（著於1930）在論及晚近詞學著述時，即將劉毓盤《詞史》與朱祖謀《宋詞三百首》、葉恭綽《後篋中詞》等著作並舉，並稱譽《詞史》“辨析源委，約而能賅”；⁸³ 又如盧前《詞曲研究》（著於1934）所列參考書中，就包括劉毓盤《詞史》、吳梅《詞學通論》、鄭振鐸《中國文學史》、徐珂《清代詞學概論》、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長編稿本》五種，並於書

⁸¹ 詳見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修訂本），頁521—568。

⁸² 1919年，胡適主張以西學方法整理國故，影響深遠，他提出：“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見《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卷1，頁532—533。劉毓盤受到時代思潮感染，其《詞史》或多或少能達到此標竿，是西方文藝科學觀的一種體現。

⁸³ 王易：《詞曲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522。

目前云,“這兩章可參考的書很多,有下面這幾部已足夠初步的研究”,⁸⁴充分說明《詞史》開創之功具階段性學術價值。

即便是現在,《詞史》對於當今學術研究亦帶來反思,尤其是傳統與現代該如何取捨。《詞史》嘗試勾勒千年詞史大概脈絡,不乏系統梳理與規律把握;但它畢竟屬草創而就的大學“講義”,本身就具有教學性質,若相比起當代“專業化”、“細密化”的詞學著作,該書難免顯得理論薄弱、材料聯綴、論證粗疏,這都是轉型時期無可避免的問題。然而,所謂現代化進程不該是全盤西方,只重系統與理論,而忽視了傳統訓練,惜當代詞學研究多踏向此道路,而遺失了劉毓盤諸人的傳統學養與趣味,未免過於“現代化”。綜觀數十年研究,多見理論框架的詞學闡述,鮮見具鑒賞性質的詞史概述。除了唐宋斷代詞史較為可觀外,⁸⁵通代詞史仍是寥寥無幾,⁸⁶而金元、明清的斷代詞史更是匱乏得很,此時段長期以來,只有張仲謀《明詞史》、嚴迪昌《清詞史》堪稱斷代史著作,整個研究氣候未免顯得太專、太狹、太理論化了,其實早年的李辰已經指出:“劉著雖然還有不少缺點,但由於直到現在,還沒有第二部較為可讀的詞史,所以它一直流傳至今。”⁸⁷當我們回頭審視劉毓盤的《詞史》,八十多年已過去,但斷代詞史與通代詞史的研究仍舊薄弱,令其開創之舉顯得珍貴,同時寂寞。到底當代詞學研究,如何在理論闡發與詞史描述的張力之間取得平衡,也許可從這本“粗糙”的《詞史》找到啟發。

五、結 語

劉毓盤長期被學界輕視的原因是:其著作惹來訾議、其詞集乏人研究、填

84 盧前:《詞曲研究》(香港:中流出版社,1974年),頁84。

85 如楊海明《唐宋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陶爾夫與劉敬圻合撰《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陶爾夫與諸葛憶兵合撰《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86 僅有許宗元《中國詞史》(合肥:黃山出版社,1990年)、黃拔荆《中國詞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87 李辰:《劉毓盤和他的〈濯絳宦詞〉》,頁14。

詞不等於學問、教育不等同學術。然而，劉毓盤的詞學貢獻則是：《詞輯》與《詞史》的文獻積累為後世詞籍整理提供便利，《詞史》多面向而客觀的理論框架為後世詞史撰寫提供借鑑，《詞史》有效推動傳統詞學向現代詞學轉型。在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時代感召下，劉毓盤《詞史》首次對中國千年詞壇進行系統梳理與規律把握，既體現傳統詞人的學養與趣味，也體現西方的文藝科學觀，是中國傳統詞學邁向現代詞學的一個代表性縮影。其著作編製雖未甚精密，但開山者的披荊斬棘無疑具階段性的學術價值，誠如《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所云：“詞史之作，始于毓盤，首創者難得全功，此書雖有闕陷，而大體純正，為詞者先讀是編，亦可得歷代詞學之大概矣。”⁸⁸本文同時關注劉毓盤當年盡責而靈動的課堂傳授，旨在反思側重學術研究而輕視課堂傳授的大學趨勢，是否有調整的需要；並藉著《詞史》反思愈趨“理論化”的學界，如何在理論闡發與詞史描述之間取得平衡。冀望學界能儘早整理出版劉毓盤的《噙椒詞》、《濯絳宦文鈔》、《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並給予應有的關注。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

⁸⁸ 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頁 795。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王易：《詞曲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
- 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吳福輝編：《梁遇春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
- 沙先一：《清代吳中詞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 胡雲翼：《詞學ABC》。上海：世界書店，1930年。
- 胡適：《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
- 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徐鑄成：《舊聞雜憶》。沈陽：遼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唐圭璋：《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陸宗達：《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 陶爾夫、劉敬圻：《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陶爾夫、諸葛憶兵：《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孫克強：《清代詞學批評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黃拔荆：《中國詞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許宗元：《中國詞史》。合肥：黃山出版社，1990年。
- 張璋等人編：《歷代詞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 楊海明：《唐宋词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趙景深主編：《戲曲論叢》第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劉毓盤：《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今圖書店，1924年。
- 劉毓盤：《詞史》。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
- 劉毓盤著，沙先一導讀，毛文琦校點：《詞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盧前：《詞曲研究》。香港：中流出版社，1974年。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修訂本。

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文學》。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譚獻著，范旭侖、弁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顧隨著，葉嘉瑩筆記：《中國古典詩詞感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二、論文

王兆鵬：《20世紀前半期詞學研究的歷程》，《文學遺產》，第5期（2001年），頁106—113。

石民：《應徵的自述》，《宇宙風乙刊》，第43期（1941年4月），頁3—5。

李辰：《劉毓盤和他的〈濯絳宦詞〉》，《魯迅研究月刊》，第8期（1987年），頁12—14。

李劍亮：《劉毓盤與民國詞壇》，《常熟理工學院學報》，第3期（2014年5月），頁77—81。

邱竹師：《附識》，《詞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33年12月），頁47—48。

查猛濟：《與龍榆生言劉子庚先生遺著書》，《詞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33年12月），頁187—188。

查猛濟：《劉子庚先生的詞學》，《詞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33年12月），頁43—48。

秋蓬：《詞籍介紹》，《詞學季刊》（創刊號）（1933年4月），頁213—218。

秋蓬：《詞籍介紹》，《詞學季刊》，第1卷第2號（1933年8月），頁203—206。

陳水雲：《浙江江山劉氏與清末民初詞學》，《浙江大學學報》，第42卷第4期（2012年7月），頁180—188。

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中國文學學報》創刊號（2010年12月），頁287—342。

陳平原：《知識、技能與情懷（下）——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北京大學學報》，第47卷第1期（2010年1月），頁133—151。

陳平原：《知識、技能與情懷（上）——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北京大學學報》，第46卷第6期（2009年11月），頁97—118。

曹辛華：《詞史的編撰與詞學批評的“現代化”進程》，《中國韻文學刊》，第1期（2000年），頁18—26。

董凱揚：《劉毓盤〈詞史〉的詞學成就》，《學理論》，第20期（2012年），頁180—181。

董凱揚：《劉毓盤的詞集輯佚研究》，《赤峰學院學報》，第33卷第7期（2012年7月），頁92—94。

劉揚忠：《二十世紀中國詞學學術史論綱》，《暨南學報》，第22卷第6期(2000年)，頁7—13。

嚴迪昌、劉揚忠、鍾振振、王兆鵬：《傳統、建構、展望——關於二十世紀詞學研究的對話》，《文學遺產》，第3期(1999年)，頁1—12。

The Colli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sm

— A Discussion on the Ci-Poetry and Educational Concepts by Liu Yupan

Ng Chi Lim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Liu Yupan, a traditional “*Ci*” writer acros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o made his name with “*Cishi*”, which was the first book in China summarizing the history of *Ci* and the principles behind systematically.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known for his “*Zhongguo Wenxue Shi*” and “*Tang Wudai Songliao Jinyuan Mingjia Ciji*”.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ies of *Ci* deserve great attention. Yet, just a few articles mentioned about him after 83 years since his death. His poor popularity has formed a sharp contrast with his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By getting into the atmosphere of *Ci* study in 1930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why Liu has been overlooked by scholars for such a long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This paper also aims to re-discover the neglected contributions made by Liu to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including how his works of “*Ciji*” and “*Cishi*” bring convenience to the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i*; how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obje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ishi*”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rafting of *Ci* history; how “*Cishi*”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i* study to modern *Ci* study. Besides,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Liu in an attempt to examine the need of adjustment of the current tendenc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which academic research was seen a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impartation. Finally, by studying “*Cishi*”,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 c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Ci* history description.

Keywords: Liu Yupan, “*Cishi*”, “*Tang Wudai Songliao Jinyuan Mingjia Ciji*”, “*Zhongguo Wenxue Shi*”,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Ci* study.